

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主体意识研究

任维杉

郑州大学哲学学院, 河南 郑州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8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30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13日

摘要

“我思故我在”是笛卡尔哲学体系中的核心命题, 也常被视为近代主体性哲学真正的开端。十七世纪以来, 传统知识权威逐渐失去原有的稳固地位, 自然科学的发展又不断冲击着旧有世界图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 笛卡尔开始重新追问: 是否存在一种完全不可怀疑的知识基础? 他采取方法论怀疑, 把感官经验、外部世界, 许多看似确定的观念, 都暂时置于怀疑之中。可就在不断怀疑的过程中, 他发现, 有一点始终无法被否定——当怀疑发生时, 思想活动本身已经存在。于是, “我思故我在”成为了他哲学大厦中的第一个确定性原则。本文主要围绕我思和我在之间的内在关系展开讨论, 对笛卡尔主要思想进行概念分析, 分析其中所包含的主体意识结构和哲学意义。通过对这一命题的梳理, 可以进一步看到, 笛卡尔实际上完成了哲学重心的一次重要转移——知识的根据不再首先来自外部世界, 而是转向主体自身的意识活动。也正因如此, “我思故我在”成为笛卡尔哲学体系的理论支点, 还开启了近代哲学对于主体、自我意识以及确定性问题的持续探讨, 深刻影响了后世主体性哲学的发展。

关键词

笛卡尔, 我思故我在, 主体意识, 理性精神

A Study on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in Descartes' "Cogito, Ergo Sum"

Weishan Ren

School of Philosophy,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Received: June 8, 2026; accepted: June 30, 2026; published: July 13, 2026

Abstract

"Cogito, ergo sum" is the central proposition in Descartes' philosophical system and is often regarded as the true beginning of modern philosophy of subjectivity. Since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raditional authorities of knowledge had gradually lost their former stability, while the develop-

ment of natural science continued to challenge the old worldview. Against this intellectual background, Descartes began to ask anew whether there could be a completely indubitable foundation for knowledge. He adopted methodological doubt, temporarily calling into question sensory experience, the external world, and many seemingly certain ideas. Yet in the very process of constant doubting, he discovered that one thing could never be denied: when doubt occurs, the activity of thinking itself already exists. Thus, “Cogito, ergo sum” became the first principle of certainty in his philosophical edifice.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Cogito, ergo sum,” conducts a conceptual analysis of Descartes’ major ideas, and examines the structure of subject consciousness and philosophical significance contained in this proposition.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is proposition, it can be further seen that Descartes in fact accomplished an important shift in the focus of philosophy: the foundation of knowledge no longer derives primarily from the external world, but turns instead to the subject’s own conscious activity. For this reason, “Cogito, ergo sum” not only serves as the theoretical cornerstone of Descartes’ philosophical system, but also initiates modern philosophy’s ongoing inquiry into the subject, self-consciousness, and certainty, profoundly influencing the later development of the philosophy of subjectivity.

Keywords

Descartes, Cogito, Ergo Sum, Subject Consciousness, Rational Spirit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方法论怀疑与“我思故我在”的提出

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提出，主要是为了回应近代早期知识基础动摇的问题。十七世纪前后，经院哲学的解释权威逐渐下降，自然科学的发展又不断改变着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旧有的知识体系已经难以提供足够稳固的根据，在这种思想处境中，笛卡尔试图重新寻找哲学的起点。刘永生指出，笛卡尔面对的是经院哲学式微与自然科学兴起并存的局面，他的任务不是在旧体系上修补，而是从根基处重新审查哲学原理，寻找一个能够支撑知识体系的可靠基础。因此，怀疑在笛卡尔那里不是消极的否定，也不是怀疑主义意义上的停滞。它首先是一种方法，通过怀疑，笛卡尔把那些未经严格审查的意见暂时搁置起来，尤其是感官经验、外部对象以及传统权威所提供的知识。感官会出错，这是日常经验就可证明的事实；梦境使人难以立即区分真实经验和虚幻经验。进一步说，生活中看似最确定的判断，也可能在极端设想中受到欺骗。笛卡尔借助这种层层推进的怀疑，把一切可能出错的东西排除出去，直到发现一个不能再被排除的事实。这个事实就是怀疑本身。人可以怀疑外物，可以怀疑身体，甚至可以怀疑已有知识的可靠性；但当怀疑发生时，怀疑这一活动已经在进行。若继续怀疑自己是否正在怀疑，这个新的怀疑仍然证明了思想活动的存在。黄启祥在讨论笛卡尔哲学史观时也指出，笛卡尔没有像一般怀疑主义者那样把“无知”作为终点，而是通过怀疑获得一种明证知识：即便所有外在对象都可能不真实，怀疑活动自身却不能被取消^[1]。由此，“我思故我在”得以成立。它的基本意思并不是先证明外部世界，再推出主体存在，而是从正在进行的思想活动中确认思想者自身。只要我在怀疑、判断、否定或思考，我就不能同时否认自身作为思想者的存在。“我思故我在”的提出标志着哲学出发点的变化，知识的根据回到主体自身的意识活动。笛卡尔以怀疑开路，却并未停留在怀疑之中；他通过怀疑发现了一个最低限度但不可动摇的确定性，即作为思维者的“我”必然存在。这个命题成为他重建知识体系的第一支点。

2. 主要内涵

1、“我思”：作为意识活动的思想

“我思故我在”是理解笛卡尔哲学绕不开的命题。要准确把握它的意思，就不能把“我思”中的“思”简单理解为推理、判断或概念演绎。笛卡尔的“思”，广度很大，它不只涉及冷静的理性计算，也包括怀疑、猜想、肯定、否定、理解、想象，甚至感觉。笛卡尔在《哲学原理》中明确指出：“所谓思想，我是指凡是在我们心中发生而又被我们直接意识到的一切东西”。凡是以意识活动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内容，都可以被归入“思”的范围。换句话说，“我思”强调的不是某一种具体的思想内容，而是主体正在进行精神活动的事实。笛卡尔把“思”作为哲学的起点，在普遍怀疑中，外部世界是否真实、感官经验是否可靠，数学知识是否绝对确定，都可以被暂时放入怀疑之中，可怀疑本身正在发生。即便我怀疑某个对象是否存在，怀疑这一活动也已经作为一种思想活动出现了。甚至当我怀疑自己是否正在怀疑时，这种新的怀疑仍然说明思想活动并未消失。由此看来，“我思”并不是从外部对象那里获得的知识，也不是经验积累之后的结论，而是主体在思想活动发生的当下，对自身意识状态的一种直接把握[2]。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看，“思”通常可以指向外物，比如我思考一张桌子、一个身体、一个世界，或者某个数学命题。但在笛卡尔的怀疑过程中，思想开始转向自身。主体不只是意识到某个对象，也意识到自己正在意识、正在怀疑、正在判断。正是在这种回返自身的活动中，“思”不再只是认识对象的手段，而成为主体确认自身存在的入口。已有研究也注意到，笛卡尔并不是从思想对象出发寻找确定性，而是把目光转向思想活动本身；他通过“思”的不可取消性，确立了“我”作为知识起点的地位。因此，“我思”的重点，并不在于它给出了某个关于世界的具体答案，而在于它显示出一种最低限度却十分坚固的确定性：当一切可疑之物都被暂时搁置之后，思想活动仍然无法被排除[3]。只要思想正在发生，主体就不能把自身完全设想为不存在。也正是在这里，笛卡尔把看似消极的怀疑转化成了通向确定性的道路。怀疑越深入，越能暴露出怀疑活动自身的不可怀疑；越想清除一切不可靠的东西，越会留下一个无法清除的事实，活动主体本身正在进行思考。

2、“我在”：作为思维主体的存在

在理解了“我思”之后，还需要进一步追问：“我思故我在”中的“我在”究竟意味着什么。这里的“在”，不是通常意义上身体的存在，也不是经验世界中那个具有姓名、身份、位置和生活经历的具体个人。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笛卡尔写道：“让他尽量欺骗我吧；只要我在思想，他就永远不能使我成为虚无。”笛卡尔在方法论怀疑中，已经把身体、感官以及外部世界的可靠性暂时放入括号之中。因此，当他说“我在”时，重点并不在于证明“我作为一个有身体的人存在”，而在于确认“我作为一个正在思想的主体存在”[4]。这一点值得特别注意。按照日常理解，人往往先把自己看作身体性的存在：我在某个地方，有形体，会行走、饮食、观看和触摸。可是，在笛卡尔那里，这些看似自然的经验并不稳固。就好像梦境中，人在梦中也会觉得自己正在行走、观看或触摸某物，但醒来之后才发现，这些身体活动并没有真实发生。从“我好像正在走路”，并不能可靠地推出身体真的在走路；更稳妥的说法只是，“我意识到自己好像正在走路”。这样一来，能够被确认的并不是身体动作本身，而是有一个正在经验、正在意识、正在思想的心灵活动。因此，“我在”首先指向的是思维之物的存在。这个我的根本特征不是身体，而是思想，换句话说，在知识的次序中，最先被确认的不是我的身体，而是我正在思想；也不是我作为经验世界中的某个人存在，而是我作为思想活动的承担者存。所以，“我在”具有一种特殊的确定性。一般对象是否存在，往往需要借助感官、推理或其他证明来判断；但我在并不依赖这种外在证明。不过，也不能把这里的“我”理解得过于丰满。笛卡尔首先确立的，并不是一个拥有完整人格、社会身份和生活关系的自我，而是一个最低限度的“我”：作为思想活动承担者的主体。这个主体还不是日常生

活中那个具体而丰富的人，而是哲学莫基层面上的思维主体。也正因如此，笛卡尔的“我在”一方面具有极强的确定性，另一方面又带有明显的抽象性。它能够保证思想主体的存在，却还没有充分说明身体、他人以及外部世界如何重新与这个主体建立联系。

3、“故”：不是简单因果，而是直接的必然关联

理解“我思故我在”，不能绕开其中的“故”。这个“故”很容易被理解成一种普通因果关系，好像是说：因为我先思想了，所以我后来才存在。这样理解的因果关系并不准确。严格说来，“我思”并不是“我存在”的原因，思想活动也不是先孤立地发生，然后再制造出一个主体。更恰当的说法是，“我思”和“我在”是在同一个意识活动中一并呈现出来的。思想发生的时候，思想者的存在也随之被揭示出来。“我思故我在”呈现出的，不是简简单单的日常的因果推论，是一种更直接的必然关系。只要我正在思想，关键的其实不在于先设定一个外在前提，再通过层层推理去证明“我存在”。更重要的是，当主体开始思考的那一刻，他就已经直接意识到了自身存在这一点。因为只要“我在思考”成立，“我不存在”就不可能同时成立。所以这个命题的力量并不来自复杂的论证，而在于一种几乎无法被怀疑的、自我当下的确认。围绕这一点，学界也常讨论一个问题：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究竟是不是一个三段论[5]？如果把它写成严格的三段论，大概会是这样，凡是思想者都存在；我正在思想；所以我存在。表面上看，这种表达很清楚，但问题也随之出现。倘若“我思故我在”必须依赖“凡思想者都存在”这个大前提，那么它就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原理，而是建立在另一个更早的命题之上。这样一来，笛卡尔想要寻找的那个最初的、不可怀疑的知识起点，反而被削弱了。因此，对“故”的理解，不能只停留在形式逻辑的层面。笛卡尔的文本中确实出现过类似“推论”的说法，但他同时也强调，这一命题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三段论，而更接近心灵的直接把握。我们把它放回笛卡尔的分析方法中来看：主体并不是先接受一套定义、公理和推理规则，再一步步推出“我存在”；相反，他是在普遍怀疑的过程中不断排除可疑之物，最后发现怀疑活动本身无论如何都排除不掉。也正是在这一刻，“我思”与“我在”的关联被直接看见了。这里所说的“直观”，不是感官上的直觉，也不是模糊的心理感觉，而是心灵对清楚明白内容的直接把握。主体在怀疑中发现，哪怕一切外部对象都不可靠，哪怕身体经验也可能出错，思想活动本身仍然无法被取消。既然思想正在发生，那么作为思想活动承担者的“我”也就不能被彻底否定。这个过程并不复杂，却很有穿透力。“我思”不是用来从外部证明“我在”的工具，而是“我在”得以显现的方式。主体是在思想活动的发生中确认自身，也正因为如此，“我思故我在”才不同于一般知识命题。它不是关于某个对象的经验判断，而是主体在自我意识中把握自身存在的基本形式。

4、“我思故我在”的确定性与第一知识地位

“我思故我在”在笛卡尔哲学中承担着“第一知识”的角色。笛卡尔要寻找的，不是一条普通的哲学命题，而是一个能够经受彻底怀疑的起点。这个起点不能依附于传统权威，也不能建立在感官经验之上，相比之下，“我思故我在”下的怀疑本身并没有取消它，而是在不断确认它。从知识次序来看，“我思故我在”的优先性也需要认真理解。它不是说人最早认识到的知识就是“我存在”，也不是说它是关于世界的第一条经验判断[6]。恰恰相反，它是哲学反思中最先获得确定性的命题。外部世界是否真实存在，身体是否可靠，上帝是否存在，这些问题在笛卡尔那里都还需要进一步论证；但“我作为思想者存在”却不必等待外部证明[7]。只要思想活动正在发生，思想主体的存在便已经显露出来。“第一知识”，它不是生活时间上的“最早”，而是哲学奠基意义上的“最先”。人在日常生活中当然会先接触父母、身体、物品和周围环境，也会自然地相信世界的存在。但这些朴素信念一旦进入笛卡尔的怀疑程序，就都可能被暂时搁置。唯有“我思故我在”很难被同样的方式排除掉。正因为它能够在最严格的怀疑中保留下来，它才成为笛卡尔重建知识体系时最初的支点。宋博关于“第一知识”的讨论也提醒我们，这一命题虽然涉及“思想者皆存在”“何为思想与存在”“我思是否先于我在”等复杂问题，但在笛卡尔的

知识次序中，“我在”作为实体知识仍然具有基础地位。“我思故我在”的确定性，还与笛卡尔所说的“清楚明白”标准密切相关。真正可靠的知识，必须以清楚、明晰的方式呈现给心灵。当主体在怀疑中把握到“我正在思想，因此我不能不存在”时，这种把握并不含糊，也不需要绕到外部世界去寻找担保。它是在心灵自身的活动中被直接看见的。正因如此，笛卡尔才可能以这一命题为起点，继续讨论上帝、外部世界以及科学知识的可靠性。不过，“我思故我在”的第一性也不能被夸大。它并不意味着只要确立了这个命题，整个世界就会随之被推出；也不意味着主体已经掌握了全部真理。它更像是知识大厦的第一块基石，作用有限，却不可缺少。

5、“我思故我在”中的主体结构

经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我思故我在”并不只是确认了一个孤立的“我”的存在。它更深层的意义在于，笛卡尔借此揭示了一种自我意识结构[8]。主体一方面是思想活动的承担者，另一方面又是在这种思想活动中被显现出来的存在者。它不是先把自己当成一个外在对象来观察，然后才认识自身；主体恰恰是在思想返回自身的过程中，发现自身无法被彻底否定。这一点构成了笛卡尔哲学中重要的转向。传统认识模式往往从对象出发，认为人通过感官接触外物，再由此形成知识。笛卡尔的路径则有所不同。外部对象是否真实，感官经验是否可靠，这些问题在普遍怀疑中都还没有得到保证。于是，主体必须先退回到自身的思想活动之中。这个退回并不是逃避世界，而是在知识基础动摇时寻找一个更稳固的支点。也正是在这里，认识的起点从外部对象转向了主体自身，从经验世界转向了自我意识。不过，这种自我意识也不能被理解得过于丰满。笛卡尔首先确立的“我”，并不是现实生活中那个有身体、有情感、有社会身份的人，而是一个作为思维活动承担者的主体。这个“我”很确定，却也很抽象。它能够保证主体作为思想者的存在，却还没有充分说明身体如何与心灵相联系，也没有说明他人和外部世界如何重新进入主体的认识范围。后来的哲学家之所以不断讨论身体、主体间性和生活世界等问题，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笛卡尔留下了这些未完全展开的空间。“我思故我在”的核心贡献，是在最低限度上确证了主体的存在。只要我正在思想、怀疑、判断或意识到某物，我就不能同时否认自己作为思想者而存在。它并不直接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也不立即解决人与身体、他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但它给出了一个不可轻易动摇的起点。通过“我思”，笛卡尔揭示了意识活动的不可取消性；通过“我在”，他确认了思维主体的存在；而“故”则表达了思想活动与主体存在之间那种直接而紧密的关联。在这一意义上，“我思故我在”不仅是关于个人存在的判断，更是关于主体、自我意识和知识基础的哲学命题，也为近代主体性哲学的展开奠定了重要基础。

3. “我思故我在”的主体意义

“我思故我在”真正重要的地方，是它重新改变了哲学看待“人”的方式。笛卡尔想表达的，并不只是“人能够思考”这么简单，而是把“正在思考的主体”放到了知识建立的核心位置。也就是说，主体不再只是被动地接受外部世界的信息，而开始成为判断什么是真、什么是可靠，以及知识如何重新建立的起点。这是第一次如此明确地凸显了人的理性能力。真理不再只是依附于传统、权威或者某种既定秩序，人必须通过自身的思考、怀疑和反省，才能真正确认它。换句话说，哲学开始把“人的自我意识”看作理解世界不可绕开的基础。

换言之，“我思故我在”真正奠定的是一种近代理性主体的原则，即人能够凭借自身的思维能力为知识寻找根据。它的深层意义也正在这里，主体开始从世界秩序的从属位置中被凸显出来，成为哲学问题的中心。与此同时，这一命题还使自我意识具有了奠基价值。自我意识不再只是心理层面的自我感觉，而是知识得以可能的基础结构；主体只有意识到自身的思想活动，才可能进一步追问世界、真理和存在。正因如此，笛卡尔之后的近代哲学越来越重视“主体如何认识对象”“知识如何获得确定性”“自我意

识如何参与经验构成”等问题。康德关于先验主体的讨论、德国古典哲学对自我意识的深化,以及现象学对意识结构的分析,都可以看作是在不同层面上回应笛卡尔所开启的问题。当然,“我思故我在”并非没有局限。它确立的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思维主体,对身体、情感、他人和现实生活世界的说明并不充分。但也正因为这种未完成性,它反而推动了后世哲学继续追问主体与世界、主体与身体、主体与他人的关系。总体来看,“我思故我在”的主体性意义不在于给出一个关于个人存在的简单结论,而在于它确立了近代哲学的主体原则:主体以自我意识和理性反思为基础,成为知识确定性和哲学思考的核心。

参考文献

- [1] 黄启祥. 从笛卡尔的哲学史观看“我思故我在”[J].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40(2): 15-20.
- [2] 孙冠臣. 笛卡尔“我思”的三个发生场域[J]. 现代哲学, 2018(3): 86-92.
- [3] 郝春鹏. 作为怀疑的想象及其在笛卡尔哲学中的两个作用[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67(5): 30-40.
- [4] 尹兆坤. 现成性或实在——对笛卡尔存在意义问题的现象学研究[J]. 世界哲学, 2025(3): 120-132.
- [5] 叶斌. “我思故我在”三段论解释的可能性[J]. 学术交流, 2022(6): 20-32.
- [6] 笛卡尔. 形而上学的沉思[M]. 巴黎: 弗拉马里翁出版, 1992.
- [7] 陆秀红, 黄成驰, 张毅. 笛卡尔的普遍数学思想与其上帝观的发生逻辑[J]. 自然辩证法, 2022, 38(2): 73-78.
- [8] 刘凤娟. 笛卡尔循环与康德的解决——以逻各斯精神为研究视角[J]. 湖北社会科学, 2016(6): 96-102.